

# 山东出土汉代灯具研究

□ 宋 叶 刘晓婧

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实物证明,至迟在战国时期,灯已经被广泛使用。《楚辞·招魂》载:“兰膏明烛,华镫错些”。“镫”,汉代时写为“灯”,由“金”和“登”字组成,“登”字下从“豆”,可见最早的灯应该由豆发展而来<sup>[1]</sup>。战国时期的青铜灯制作技术较为成熟,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在战国基础上,汉代灯具进一步发展,品种多样,数量众多,材质丰富,制作技术高超,使用普及,分布遍及全国各地。应该说,汉代是我国古代灯具的繁荣鼎盛时期。

作为一种照明工具,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密切相连,而处于汉代鼎盛时期的灯能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山东地区是汉代墓葬的集中地,已发现的两汉时期的墓葬数以千计,其中灯具的数量亦较为可观,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材料基础。

## 一、山东所出汉代灯分类

灯具形式复杂多样,按使用方式可分为立灯(主要为连枝灯)、座灯(主要包括豆形灯、耳杯形灯、卮灯等器皿形灯以及动物形灯和人物形灯)、行灯、吊灯、提灯等;按总体造型可分为器皿形灯、连枝灯(植物形灯)、动物形灯、人物形灯。本文按后一标准对山东地区出土汉代灯进行分类探讨。

### (一) 器皿形灯

可分为豆形灯、行灯、耳杯形灯、覆碗状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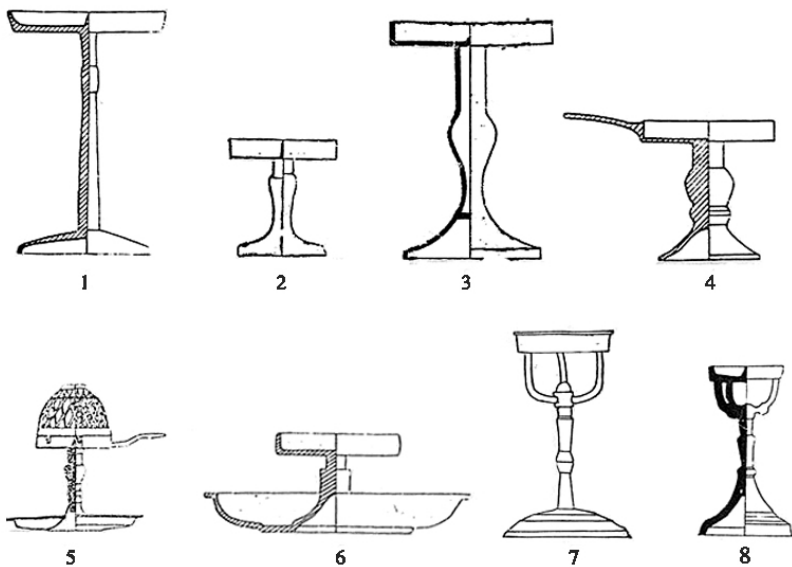
1. 豆形灯。依据质地,造型各有特色。

铜豆形灯,数量最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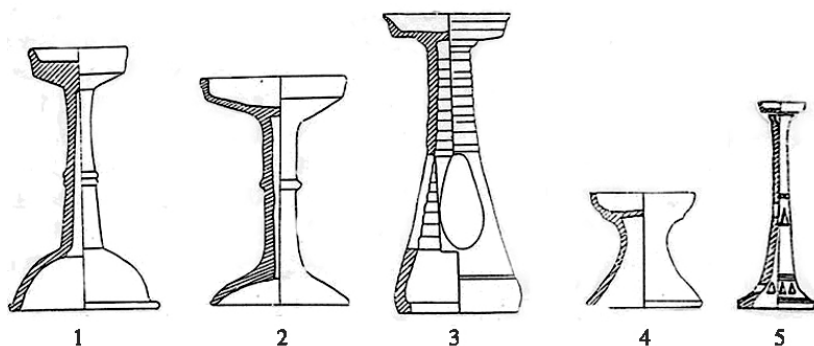
类最为丰富。可分为四式。

式,一般由灯盘、灯柄、灯座组成,结构简单。灯盘多数为浅盘,平底,盘中有尖钉,灯柄有高有短,有的柄中部圆鼓或饰凸弦纹,灯座多为喇叭形圈足。此式是一种常见的类型,发现数量多。济南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现2件,大小相近,形制相同,敞口,浅平盘,盘中心铸有一锥状烛插头,细高柄,喇叭形圈足,通体素面(图一,1)<sup>[2]</sup>。菏泽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发现2件,直壁,浅盘,平底,盘中有尖钉(图一,2)<sup>[3]</sup>。莱芜东泉河村发现1件铜灯,灯盘直口,直壁,平底,中心有圆锥形钎,高柄,柄中部圆鼓,喇叭形圈足(图一,3)<sup>[4]</sup>。

式与式相比,灯盘的口沿上伸出一叶形或扁形柄(或鏊),便于手提。临沂沂水龙泉站西汉墓发现1件,圆口,浅盘,竹节柄,喇叭形圈足,顶盘一侧有一扁形柄,柄和圈足部饰细弦纹(图一,4)<sup>[5]</sup>。德州平原县王韩村汉墓发现1件,一侧有一短柄,高2厘



图一 铜豆形灯



图二 陶质豆形灯

米,盘直径6厘米<sup>[9]</sup>。

式,与式相比,灯下有一承盘,古籍中称为“槃灯”。济宁微山马陵山发现1件,由底盘、灯柱、灯盘、灯罩四部分组成。底盘中心内凹,凹处连接竹节形灯柱,灯盘直腹,上有一匕形扳手,灯罩透雕菱形格,顶部中心有一圆形烟道。此灯造型别致而独特(图一5)<sup>[7]</sup>。潍坊五莲张家仲亩汉墓也出土1件(图一6)<sup>[8]</sup>。

式,灯盘较为特殊,呈圆环凹槽形,用三叉托连在把座上。潍坊寿光纪国故城附近发现1件,浅盘,盘中间有锥形小柱,盘内有烟垢痕迹,高柄,下端两管镶入箍内,上端分三直柱,都为直角,向上托住灯盘,座为覆碗式,上有三道凸棱(图一7)<sup>[9]</sup>。章丘东平陵故城出土1件,盏心有一烛钉,盏盘由三叉形支架相撑并与柄相接,柄作竹节形,下接喇叭口状灯座(图一8)<sup>[10]</sup>。

陶质豆形灯,数量较多,有8件。

泰安东平王陵汉墓发现2件。一件为小浅盘,圆唇,直壁,平底,长柄,上细下粗,中部有凸棱二周(图二,1)。另一件为平唇,直壁,弧底盘(图二,2)<sup>[11]</sup>。济南张庄汉墓1件,敞口,圆唇,浅盘,竹节状高空心柄,柄下部分列三个椭圆形大镂孔(图二,3)<sup>[12]</sup>。济宁东汉墓3件,泥质灰陶,敞口,喇叭形圈足(图二,4)<sup>[13]</sup>。临沂莒县沈刘庄汉墓2件,盘与柄可分开。盘为方唇,直壁,平底,柄呈喇叭状,中空,圆足,柄下部饰两周三角形镂孔(图二,5)<sup>[14]</sup>。

铁豆形灯,出土地点很少,数量不多。潍坊五莲张家仲亩汉墓发现1件,平盘,细高柄,柄部饰一周凸弦纹,喇叭形圈足(图三,1)<sup>[15]</sup>。菏泽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出土10件,高把豆形,盘中有尖钉(图三,2)<sup>[16]</sup>。

## 2. 行灯

据一些灯的铭文上称“行灯”而得名。其灯盘如

同豆形灯的灯盘,口沿上伸出一鑿,底部有三足。菏泽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发现1件,铜质,底部附三蹄足,柄作舌状(图四,1)<sup>[1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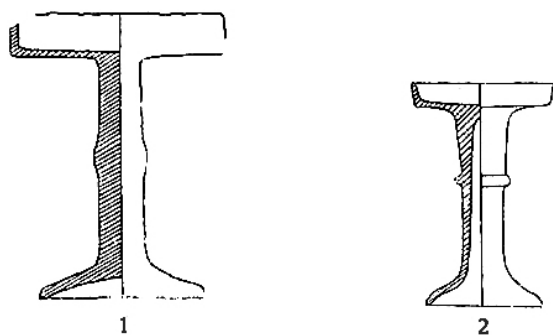
## 3. 耳杯形灯

耳杯是汉代流行的饮酒器,造型为椭圆形,两侧各附一半耳形端手。耳杯形灯形似耳杯,上加有篷形盖,盖的一半可以揭开,翻转在另一半上,两半以活轴相连,金石学家称活轴为“轱辘”,灯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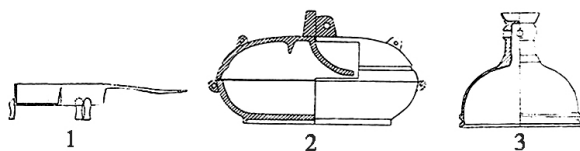
“轱辘灯”。盖的一半翻上后即成为灯盘,盘内侧有一小流嘴,便于倒油。此类灯往往装饰有龙、虎、斗兽纹以及卷草纹、三角纹等纹样。淄博临淄金岭镇一号汉墓发现1件,铜质,造型别致,整体形状为椭圆形,口部两端各一桥形钮。杯体平沿,曲腹,矮圈足。盖分两半,一半与杯体铸成一体,另一半内有一烛钎,翻开后烛钎向上。盖面由锯齿纹十字隔梁分成四区,各区均刻划一带翼兽纹,顶面两端亦各一桥形钮。器底也刻一兽,头似龙首(图四,2)<sup>[18]</sup>。

## 4. 覆碗状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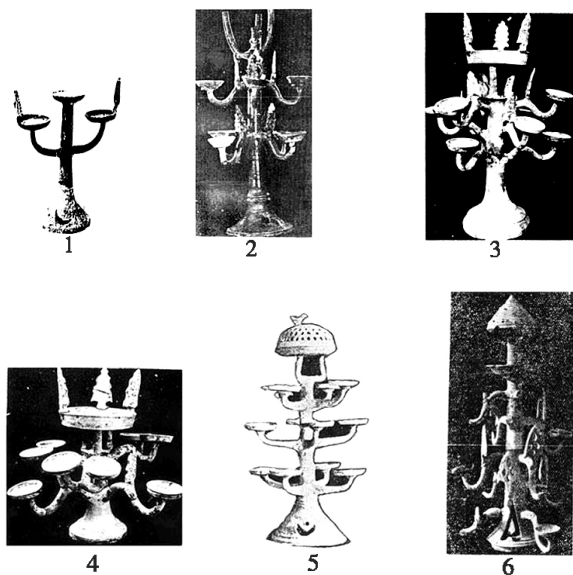
灯座为覆碗状,筒状灯柱与灯座相连,灯盘为浅盘。此类灯极为少见,为一种比较特别的类型。平阴孟庄东汉画像石墓发现1件,为泥质灰陶,覆碗状底座,中空。筒状灯柱与灯座相连,柱上宽凸棱,上有4孔,两两对穿。顶端有一浅盘(图四,3)<sup>[19]</sup>。



图三 铁质豆形灯



图四 行灯、耳杯形灯、覆碗状灯



图五 连枝灯

### (二) 连枝灯

整体灯形似花树,树干上有规律地分层伸出枝条,并托出灯盘。树干顶端用灯盘、博山炉或朱雀灯动物造型加以装饰。按照灯盏数目有三枝灯、八枝灯、十枝灯、十二枝灯。目前山东地区发现汉代的连枝灯中有 7 件陶质,1 件为釉陶,未见青铜连枝灯。

陶三枝灯 2 件,章丘县普集镇汉墓出土。造型较简单,柄中部对称伸出两枝条,枝条各托出一灯盏,盏上各立一叶;顶端也有一灯盏,灯座上饰一月形镂孔(图五 1)<sup>[20]</sup>。

陶八盏连枝灯 1 件,德州平原县王韩村汉墓出土,通高 74 厘米。灯顶中间为开屏孔雀,外面是三根立柱。灯中段为两层,每层四个钩形架,钩首各一灯盏,灯架根部饰三孔花叶。底座为喇叭状,饰有三个镂孔,并饰数道弦纹和波浪划纹(图五 2)<sup>[21]</sup>。

陶十连枝灯 2 件,济南青龙山汉画像石墓出土。一件高 66 厘米,底座呈覆盆状,中竖柱,柱分三级,每级有三根曲枝,第二、第三级曲枝中部饰叶,枝端均托一盏,柱顶端立三柱,上托一盘状盏,沿上立三

叶(图五 3)。另一件高 42.5 厘米,底座呈覆盆状,中竖柱,柱分二级,每级有三根曲枝,下层曲枝中部饰叶,上层曲枝分两杈,无叶,枝端均托一盏灯,柱顶端立三柱,上托一盘状盏,沿上立三叶。两灯均为泥质红褐陶,施绿釉(图五 4)<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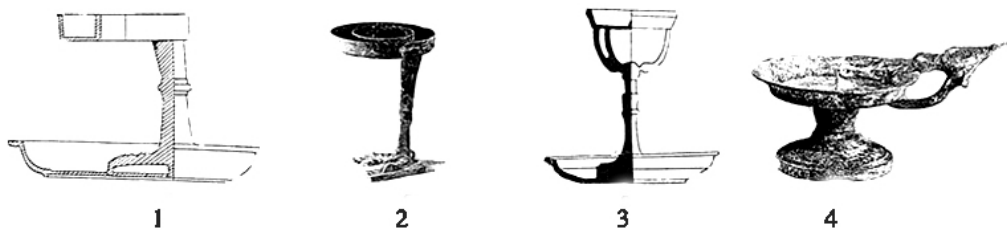
陶十二连枝灯 2 件,德州禹城汉墓出土。一大一小,大的灯盏分三层,每层四盏灯,每层灯交错叠列;顶端两立柱托出一博山炉,炉钮为小鸟形;灯座为覆碗形空心底座(图五 5)。两灯形制相同,只是火灯顶端没有博山炉<sup>[23]</sup>。

釉陶十二连枝灯 1 件,德州宁津县庞家寺汉墓出土,高 77 厘米。柄四周有钩形灯枝十二个,每个钩首各一灯盏,钩根部各饰四孔花叶形饰件一个;顶端为一博山炉,炉下有三个钩形架,架端各承一小型博山炉,小炉已残缺(图五 6)<sup>[24]</sup>。

### (三) 动物形灯

很多汉代灯是以祥瑞的动物作为制灯模型,如羊形灯、凤鸟灯、龙形灯、朱雀灯、雁足灯等等。目前山东地区考古发掘报告中可见雁足灯、鸟柄灯,皆为铜铸。

雁足灯一般以雁足作为底座,座上托出一圆环凹槽形灯盘,有的在座下有一承盘。灯铭中往往以“雁足镫”自称。淄博临淄金岭镇一号汉墓发现 1 件,灯盘呈环形,细竹节状柄,座下有一承盘,承盘为平折沿浅盘,矮圈足(图六 1)<sup>[25]</sup>。淄博临淄故城发现 1 件,上端为灯盘,内有三个圆形尖突。中柱是雁足,足蹠下有一方形座(图六 2)<sup>[26]</sup>。章丘东平陵故城发现 1 件,盘状盏,盏盘由三叉相撑并与柄相接,柄为圆柱形,雁足下有一承盘(图六 3)<sup>[27]</sup>。淄博 1992 年出土一件鸟柄灯,形态极为逼真生动,集审美和实用为一身。灯上部为圆形灯盘,中央有一锥形烛柱,中部粗把呈倒葫芦形凸起,下部是喇叭形圈足。在灯盘底部一侧伸出一圆形柄,器上铸刻一只低首引颈、口衔盘沿的小鸟,鸟足用销固定在柄上。鸟的两翅并呈扇形散开,正适于人手把持。鸟的目、喙、羽毛刻画精



图六 动物形灯



图七 人物形灯

确细致,形神兼备(图六A)<sup>[29]</sup>。

#### (四) 人物形灯

滨州博兴县出土的一人骑马铜灯,造型非常特别。该灯通高15厘米,马高13厘米,人俑坐高7.5厘米。人俑头戴圆桶状高帽,广目、大耳、高鼻,为胡人形象。两臂张开平举于身体两侧,双手各托一灯碗,灯碗举至肩平。奇特的是,人俑所戴圆桶状高帽也为一灯碗。三个灯碗内均无灯芯(图七)<sup>[29]</sup>。

### 二、各类型灯的源流及特点

两汉时期,青铜器已没有三代青铜器居于文化中心地位的光彩,开始了写实的传统<sup>[30]</sup>。秦汉大统一的局面带来了各地文化的融合,灯具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别<sup>[31]</sup>。山东所出土的灯其形制发展也是遵循着一般的规律。

豆形灯是由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盛食器——豆发展而来。战国时期普遍出现。这类灯使用时间长,形制富于变化。如灯盘上可加一叶形或扁形柄,灯下有一承盘,灯盘可用三叉托与把座相连等。山东所出此类灯中铜质的数量最多,形制最为丰富,陶质次之,铁质较少。

行灯是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形式,其灯盘如同豆形灯的灯盘,敞口、直壁、浅腹、平底,高度多在10厘米以下,盘壁外侧有一釜,底下有三足。这类灯的出土数量不多,山东目前仅见1件。

耳杯形灯,其外形仿制汉代时期常用的饮酒器耳杯,但结构造型则应是源于战国时期的盒形灯。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中出土一件椭圆形盒形灯,盖中间处用环扣状的合页连接,一半可以向另一半翻

折,翻过来即为灯盘<sup>[32]</sup>。另外,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一件球形灯,其结构造型类似<sup>[33]</sup>。只是它们外表纹饰很简单,饰有瓦纹,具有战国时期纹饰的特点,而两汉时期此类灯的装饰有龙、虎、斗兽以及卷草纹、三角纹等纹样,带有明显的汉代特征。

覆碗状的灯,较为罕见。根据其外表形态推断,它可能是由碗或碗状器发展而来。目前其他地区资料中还未见到。

连枝灯在战国时期已经较常见。两汉时期其上的装饰物多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凤雀、小鸟等。山东地区出土的连枝灯皆为陶质。

动物形灯在战国时期数量很少。雁足灯、鸟柄灯都为汉代新出现的形式,时代特征明显。

汉代的人物形灯由战国的人物灯发展而来。战国时期的人物形灯已经很普遍,山东诸城的人擎双灯便为一例<sup>[34]</sup>。只是两汉时期人物形灯中的人物造型多为奴婢或少数民族形象。

### 三、灯与两汉的社会生活

灯是日常生活的常用器,与古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及人们的生活。同时,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状况等又是灯繁荣的社会背景,两者息息相关。

#### (一) 灯与葬俗

汉代的灯绝大多数出土于考古墓葬中,与洗、钫、壶、罐、耳杯、案、锺、盘、盆、勺、炉等日用器皿组合陪葬。这表明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即使死后也要有灯陪葬。

豆形灯最为常见,平民墓和贵族墓中都有发现。豆形灯持续时间长,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都有发现。而连枝灯多发现于贵族墓中,尤其是制作比较精致、装饰繁丽的连枝灯,多与金缕玉衣或铜缕玉衣伴随出土(如济南青龙山汉墓),更加显示了墓主人的高贵和生活的奢侈。不过此时的连枝灯多为陶质,与战国时期流行铜质和铁质连枝灯的风气不同。

#### (二) 灯与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

两汉时期的建筑,特别是宫殿建筑、贵族府第,气魄宏伟,外形庞大,而室内空间空旷。室内设施则出现了案、几、床、榻等矮型家具及屏风、帷帐等屏障用具。人们习惯席地而坐。据史料记载,汉魏时期的独坐式小榻高度一般只有12~18厘米。为了能够充分发挥灯的照明作用,适应与人们的视觉习惯,灯的高度也依使用方式而有所差异。





图八 沂南汉画像石画

座灯最为常见,其中豆形灯的功能比较灵活。低矮的豆形灯可放在低矮的家具上,也可端在手中移动照明,沂南汉画像石中就有此场景(图八)。比较高的豆形灯被称为“高灯”,一般为二三十厘米,甚至高达40厘米。高灯除可放在几案上外,也可置于地上,作为整个室内的照明灯具。其他器物形灯,如耳杯形灯、覆碗状灯、卮灯等简单实用,适于放在家具上。耳杯形灯不用时可以盖上,既节省空间又可作为室内装饰,更适应汉代低矮的家具和屏风、帷帐等室内空间布局。一些动物形和人物形灯造型复杂,装饰繁华,高度从几厘米到三四十厘米不等,如淄博临淄金岭镇一号汉墓出土的雁足灯只有8.9厘米,而江苏邗江甘泉出土的牛灯高达50厘米<sup>[35]</sup>。这些灯置于桌上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环境。

立灯是指连枝灯。两汉时期的连枝灯一般都比较矮,不低于40厘米,有的高达1米多。连枝灯的高度与人们跪坐在地上的高度大体相符,符合人们局部照明的需要。连枝灯有几个或十几个灯盘,亮度比较大,加之高度较高,照亮范围很广,使室内灯光明亮,特别能满足高大的宫殿府第的照明需要<sup>[36]</sup>。

此外,汉代逐渐打破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夜间活动增多,照明的需求增大。便于移动的行灯便应运而生。行灯是在豆形灯的基础上变化而来,其造型一般较小,重量也轻。灯盘一侧有一柄,可供行走时把持,盘底带有三足,可以随时放于平地上或家具上,而不影响灯火的燃烧和照明。

### (三) 灯与人们的思想观念

汉代灯的造型多取于祥瑞题材,如雁鱼灯、连

枝灯及山东地区还没见的朱雀灯、羊灯、雁鱼灯、牛灯等等,这寄托了人们对光明幸福的追求和向往,表达了人们对吉祥如意生活的期盼。以山东地区发现的雁足灯为例。《说文》记载,“雁,知时鸟,大夫叶以为挚,昏礼用之。”《汉书》记载,武帝泰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鴈,作朱鴈之歌”。宣帝时,“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鴈五塞集殿前”<sup>[37]</sup>。可见,鸿雁在汉代被视为瑞禽,作为一种信鸟,用于聘问、婚嫁之礼。而雁足也就被用来比喻传送书信的人,雁足灯在汉代流行一时。

### (四) 灯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对立状况

人物形灯中的人俑一般都是身份卑微的奴婢形象或者少数民族,这些人手持甚至头顶灯盘,显现出一种屈从命令的姿势。作为一种身份和财富标志物,人形灯一般出土于贵族阶级的墓葬中或宫殿中,服侍于灯具主人的生前死后,这是当时阶级对立和民族矛盾的真实写照。

[1] 高蒙河《铜器与中国文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

[2]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局、长清县文化局《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5页。

[3]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480页。

[4] 刘卫东《山东莱芜东泉河村出土一批西汉文物》,《文物》1993年第12期32页。

[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博物馆《山东沂水县龙泉站西汉墓》,《考古》1999年第8期50页。

[6] 平原县图书馆《山东平原王韩村汉墓》,《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133页。

[7] 宫衍兴《山东微山县马陵山出土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85年第5期94页。

[8] 潍坊市博物馆、五莲县图书馆《山东五莲张家仲亩汉墓》,《文物》1987年第9期81页。

[9] 寿光县博物馆《纪国故城附近出土一批汉代铜器》,《考古》1984年第1期94页。

[10] 宁荫棠、牛祺安《山东章丘市东平王陵故城出土汉代铜器》,《文物》1997年第4期77页。

[1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东平王陵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66年第4期191页。

[12] 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南张庄汉代墓地发掘简报》,《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

1997年,303页。

[13]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94年第2期130页。

[14] 苏兆庆、张安礼《山东莒县沈刘庄汉画像石墓》,《考古》1988年第9期791页。

[15] 同注[8]。

[16] 同注[3]。

[17] 同注[3]。

[1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111页。

[19]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平阴县博物馆《山东平阴孟庄东汉画像石墓》,《文物》2002年第2期40页。

[20] 王思礼《山东章丘普集镇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38页。

[21] 平原县图书馆《山东平原王韩村汉墓》,《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131页。

[22] 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山东济南青龙山汉画像石壁画墓》,《考古》1989年第11期991~992页。

[23] 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禹城汉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85页。

[24] 德州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宁津县庞家寺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26页。

[25] 同注[18]。

[26]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

集 -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2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

[27] 同注[10]。

[28] 同注[26]。

[29] 博兴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博兴县出土汉代骑马俑灯》,《考古》1987年第2期187页。

[30] 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秦汉青铜器概论》,文物出版社,2002年,198页。

[31] 叶小燕《战国秦汉的灯及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7期84页。

[32] 熊传新、雷从云《我国古代灯具概说》,《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74页。

[33] 同[32]。

[34] 既陶《山东省普查文物展览简介》,《文物》1959年第11期。

[35] 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清理简况》,《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0年,116~120页。

[36] 高丰、孙建君《中国灯具简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1年,39~40页。

[37] 雷云贵《西汉雁鱼灯》,《文物》1987年第6期69页。

(宋叶,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助教;刘晓婧,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

(上接39页)

本质的不同,在面向社会群体这个方面,早期佛教活动的任务是发展壮大佛教人口,佛教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面融合,发展到唐代,所谓中国佛教完全形成,早期佛教的任务大功告成,佛教在中国形成全新的发展时期,佛教在人们心中由被动的接受到全身心的探索中去,佛教文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换言之,早期佛教重在宣传发展,后期佛教重在探索参与。

[1] 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2] 《后汉书·孝灵帝纪第八》,《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中华书局点校本。

[3] 刘景龙、李玉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天龙山文管所)